

# 贯通识力 中国气派

## ——评赵树功《中国古代文才思想论》

■廖可斌



《中国古代文才思想论》  
赵树功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人常说“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所谓“一代”的含义是什么，比较含混。有以社会制度为主要标准划分的“一代”，如“君权专制时代”，那就是约两千年；也有按王朝划分的“一代”，如“唐代”、“宋代”；还有按君主在位时间划分的“一代”，如“建安时代”、“元祐一代”等。社会上还通行按父子相承的时间，以三十年为一代。因此，所谓“一代”实际上有大、小之别。如果古人讲的“一代”多指一个朝代，那么，由于近代以来社会变迁以加速度推进，现在人们讲的“一代”就多是指小的“一代”。而在社会变迁最为急遽的时期，其实不要等到几十年，只要过一二十年，学术风尚就会发生明显变化，甚至发生逆转。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们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门重新打开，人们如饥似渴地引进西方思想学术，几乎到了唯洋是从的地步。从九十年代开始，由于国力增强，民族自信心回升，加上其它一些原因，人们开始对这种学风进行反思，进而对近代以来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的学术史进行清理，对生搬硬套西方学术模式和话语以裁剪重组中国历史文化现象的做法产生怀疑。各个学术领域都提出了回到中国本土资源、建立中国文化自身话语系统的口号。这可以说是近二十多年来中国思想学术的主流，至少是主流之一。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界，这种呼声尤为强烈。虽然近代以来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给中国思想文化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这一历史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否定，虽然现

在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也绝不应该回到封闭自足、“自以为天下之美毕在于己”的路子上去，但从总体上看，这种反思和转向是有其合理性的。一个社会的学术和思想文化就是在这样走“之”字路（当然不能总是做折返跑或转圈，更不能走回头路）的过程中逐步前进的。

在上述学术风尚的影响下，近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古典美学研究界的学者，多致力于以西方学术思想为参照，拂拭蒙积在中国古代思想学术之上的尘埃，力图重现其本来面目，揭示其内在理路。有的聚焦于一些重要理论范畴的阐释，有的侧重于梳理其演进脉络，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论著。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古典美学，犹如一位被历史的雾霭笼罩的美女，其窈窕身姿和曼妙神情正日渐清晰。或者说因为我们又一次转变了观察的心境、眼光和角度，我们又看到了她新的面相和气质。而赵树功教授的这部《中国古代文才思想论》，就是沿着这种学术研究路数最新创获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成果。其核心特点就在于贯通识力、中国气派。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最为重要的特征便是：它有一批具有中国气派的概念范畴。说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古典美学具有民族传统特色的理论范畴，我们耳熟能

详的是“比兴”、“情景”、“意境”、“韵味”、“格调”等等。这些范畴当然很重要。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古典美学确实博大精深，值得关注和考察的范畴还有很多。而且我们过去之所以一直比较重视上述这些比较纯粹的文学、美学概念，实际上还是我们按照西方注重分类的学术理念来衡量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的结果。其实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古典美学以至整个思想学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人的生活以至人和整个宇宙看成一个整体，总是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整体性来思考问题。比如中国古代文人始终将文与道联系在一起。一个文人没有“文”，自然算不上是一个文人；但

如果不求“道”，则也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文人。因此孔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成为中国古代仁人志士的人生信仰；宋代刘挚所说的“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也成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共识。很少有士大夫把文学事业当成自己唯一的人生目标。他们都追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他们即使探讨文学问题，也往往是把文学纳入天地、社会、人生、心灵的大系统中来观察和思考，并力求将之贯通的。他们所追求的，不限于纯美，而往往是大美、深美。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和美学家，即使研究的是文学和美学问题，往往也并不仅仅关注文学和美学；有时探讨的主要不是文学和美学问题，但也与文学和美学问题有关。按照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古典美学的这一特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古典美学，就不能只关注那些按照西方注重分类的学术理念来看属于比较纯粹的文学、美学范畴的概念，而且还要关注那些探讨天道、政道、人道的概念范畴，如“阴阳”、“和谐”、“性理”、“气”、“才”等等。这些概念同样重要，甚至可能更为重要。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些概念，我们构建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美学体系就是残缺不全的。而且，正因为古人是将天

道、政道、人道、文道等贯通起来进行思考的，所以我们在探讨古人的这些文学理论和美学概念时，也就必须打通考察，而不能只截取其中属于比较纯粹的文学和美学理论的环节进行分析，那样就会不得要领。

让我感到极为钦佩的是，赵树功教授的《中国古代文才思想论》就正是这样做的。该书从“才”这个概念的本源开始说起，探讨了“才”与天道、天赋人性的关系，考察了它从本体论、人性论的概念转化为文学和美学理论概念的机理和过程。然后集中分析了“才”的内涵与外延，辨析了“才”与“德”、“学”、“识”、“情”、“气”的关系。接着进入文学创作环节，考察了“才”在具体创作过程中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以及与“法”、“调”等的互动机制。最后，再延伸至具体文学创作环节之外的文学活动过程以至文人的整个生命过程，探讨了古人关于“才”与“命”、“运”等的错综交织关系的思考。全书结构天矫如龙，血脉贯通，淋漓酣畅，对“才”这一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古典美学的重要概念进行了系统考察和深度阐释。我相信，本书是按照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古典美学自身的特点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古典美学内涵的一次成功尝试，其选题立足于中国气派、民族特征；其研究思理、建构法式同样立足于古代文艺理论范畴文史哲融通的本体特性，出入史的剖辨中体现了作者讲述“中国故事”的贯通识力。该著作不仅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理论观点，而且在研究思路和研究范式上也具有创新意义。

《亚洲的去魔化》一书的标题并非“祛魅”的糙版定义——后者已经在中文语境中被赋予了太多的“正能量”，而德国史学家于尔根的“去魔化”却不大像褒义词。它所指涉的语境是中性的，亦即十八世纪以来欧洲对亚洲在文化观感、知识储备和探索模式上所发生的渐变。在此之前，对于欧洲人来说，那块古老而丰饶的大陆是遥远的梦中梦，在此之后，它却被欧罗巴的各个民族拉到眼前，用放大镜仔细观瞧。这种变化引发的后果深远且复杂，其核心则在于如何通过这个遥远的他者来确定自我。正如作者所说：“在试图确定欧洲在当代世界的位置之际，没有任何时代比十八世纪更富启发性。”

尽管这是一个各种“主义”和“主张”多声复义的时段，但十八世纪的欧洲，仍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启蒙主义诞生并急速膨胀的时代。正是这种精神打开了关注亚洲的眼界。在于尔根看来，尽管那仍然是一个小欧洲和大亚洲并行的时代（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双方的贫富差距才开始急速拉开），双方态度的差异却已经预示了未来局势的变化：欧洲人不仅对亚洲“脑洞”连篇，也热衷于实地探险。相反，亚洲在这段时间的固步自封却是一个著名的遗憾：只有在少数国家的某些时刻，如十七世纪的日本，才有过系统的欧洲研究。

对于许多批判现代性的思想者而言，欧洲启蒙主义与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相比，与其说是不同的思想岔路，不如说只是同一个扩张过程的头脑和手脚罢了。于尔根的态度倒没有那么激进。他以一个“史学家”的中性口气带领我们回到“现场”，梳理彼时关于亚洲知识

# 亚洲的“没落”与欧洲的自大

## ——评于尔根《亚洲的去魔化》

■卢冶

的诸多脉络。虽然在微观性的方法论和倾向性上，多少能看到一些福柯式“知识考古学”的影响，但本书仍是较为规矩、甚至带点“科普”成分的史学著作。最明显地体现出作者观点倾向的，是他重点描述的那个世纪的结尾。对于亚洲来说，1800年代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还有萨义德二十年前补上的东方主义，所有这些意识形态的控场端倪都出现在这个时间点前后。它是一个世界史的分水岭。十八世纪，欧陆对亚洲张开的探索羽翼曾宽广又舒展，十九世纪初，这种相对包容的态度却迅速收拢到几个窄口的、并不透明的学科瓶子里。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在古代和中古亚洲史形成了新的学院式的专科之际，亚洲尊严的捍卫者们就被边缘化了，对亚洲的热情也被欧洲的自我满足所取代。人们开始崇尚罗马式的统治，以古希腊曾屈从于埃及这些东方国家的诱惑而失败为鉴。东方的形象从正面过渡到负面，而欧洲的主流心像，也从一种推论性的欧洲中心论，发展到以假设为前提的排他性中心论。一边在态度上保持距离，一边在事务上深度干预，这种改变的征兆，可以从奥斯曼帝国被东方化、克里米亚和伊斯兰世界边缘的多民族被异国情调化、印度人从东印度公司的高层被排挤，以及欧洲使

节逐渐拒绝屈从亚洲的宫廷礼仪等细节中，越来越多地浮现出来。

于尔根说，这个时代发明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就是文明论。从十八世纪中期起，出现了一种意味深长的人类学标尺：野人、蛮人、文明人。这是一道逐渐变化的光谱，但几块大陆在其中的位置却基本上是固定的。以本书谈论女性的一章为例。将对待女性的方式放置在东西方文明的大框架里去打量，正是十八世纪的发明，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演变，最终导致了重视女性=文明人=欧洲这一简化却有效的等式。作者指出，相对于焚烧女巫，对女性的去魔化、科学化乃至学科化，在很多时候的确是“一种理性的胜利”，但他提醒我们，与这种胜利同时泼出去的还有亚洲的魅力，以及亚洲女性对于自我生存处境的感受和评判。

这是《亚洲的去魔化》给予我们的最大的启发：启蒙主义的结构弊端，也是现代性的弊端之一，就是将多汁的、图像化的、直觉的、感官的前现代用一种冰冷的机械模式读解和过滤，用于尔根的话说，这是“一种美学经验的溃败”。在文化保守主义者和先锋派时而敌对、时而同盟的复杂关系中，我们往往会在前者的诉求中发现“打捞传统直觉”的维度。但尝试从本书对“去魔化”的态度延伸下去，就会来



《亚洲的去魔化》  
[德]于尔根著 刘兴华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到“再魔化”的问题。比如张艺谋的早期电影中看到的“东方主义”曾因为迎合着西方人的“再魔化”而受到批判，那么另一方面，它是不是在某种意义上也复原了亚洲的魅力呢？

答案并没有这样乐观，因为这些符号已经事先经过了删选、修正和过滤。而这个“事先”的位置，正是“欧洲的十八世纪”之后发生的欧亚时间差：被强行去魔化的亚洲开始采用欧洲的结论来定位自我，这导致此后的两个世纪中，亚洲一直被绑定在它的假想敌的世界战车上。那正是近来张艺谋在某访谈中，解释他接拍电影《长城》的原因时所揭示的：为了让中国电影“走出去”，在“全球五千家影院放映”，他可以接受以他的名义来和西方的投资者们拍摄一部充满孔明灯、士兵方阵的影片。

或许这是世界史本身的一个趋势：人类“理性”的增长，很可能也意味着“我执”越来越炽盛。这不仅是欧洲的问题。